

长江经济带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响应分析¹

何小芊¹夏云帆²

1. 东华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2. 东华理工大学地球科学学院

摘要: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重要的旅游资源,厘清非遗与旅游业之间的联系,对于促进非遗的旅游开发、推进文旅融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以长江经济带 9616 项国家级和省级非遗为研究对象,在构建非遗旅游响应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 TOPSIS 法从省域、市域两个尺度测算长江经济带非遗旅游响应水平,采用地理探测器分析响应水平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从分布情况看,长江经济带非遗呈现出显著的集聚型分布态势,存在 3 个极高密度核心区与 3 个次高密度核心区;从响应水平看,在省域和市域尺度上长江经济带非遗旅游响应水平均处于较低水平,且非遗旅游响应水平的区域差异明显,呈现出从长江上游向中游和下游递增的趋势;从影响因素来看,省域尺度和市域尺度的主要影响因素一致,经济发展水平、旅游业发展水平、居民消费水平对提高长江经济带非遗旅游响应水平具有十分显著的正向影响。为促进长江经济带非遗旅游的发展,需要深入践行文旅融合发展理念,采取差异化的区域非遗旅游发展策略,并在非遗旅游发展中突出地方文化特色。

关键词: 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响应;熵权 TOPSIS;长江经济带;

一、引言

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非遗”)源于人类的生产生活实践,是一个国家和地区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底蕴的生动体现,是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需要、增进民生福祉、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能。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的融合发展。”^[1]非遗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所具有的文化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等,使其存在巨大旅游开发潜力^[2],非遗旅游已逐渐成为文旅融合发展的重要环节。“响应”一词源于物理学,指系统在激励作用下而产生的反应。^[3]在旅游研究中,旅游响应被视为旅游业与其他产业或事物间的互动关系。^[4]非遗旅游响应度是描述非遗资源对旅游发展作用强度大小的指标,反映了非遗资源旅游开发的适宜程度及其在旅游发展中的重要程度。作为一种重要的旅游资源,非遗对旅游业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通过科学的方法厘清非遗与旅游业之间的联系,对于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推进文旅融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部三大区域,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关乎国家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长江经济带区域的非遗资源和旅游资源均十分丰富,具有良好的文旅融合发展的经济基础、生态基础和文化基础,促进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有利于加快形成长江经济带新的发展优势。基于此,本文以长江经济带国家级与省级非遗为研究对象,在分析长江经济带非遗空间分布特征的基础上,构建长江经济带非遗旅游响应评价体系,测算长江经济带非遗旅游响应水平并探讨其影响因素,以期优化长江经济带非遗保护与旅游开发、促进文旅深度融合提供有益借鉴。

二、文献综述

¹ **作者简介:** 何小芊,东华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区域旅游开发与管理;夏云帆,东华理工大学地球科学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为旅游地理研究。(江西南昌 330013);

基金: 江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江西省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路径与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3GL17);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招标课题“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旅游资源社会价值评估及实现路径研究”(项目编号:JD20004);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旅游产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和旅游产品的推陈出新，非遗资源的旅游开发得到政府部门、行业组织的高度重视，非遗旅游随之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一大批学术成果涌现，推动非遗旅游研究进入更深层次。目前，国内关于非遗旅游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研究内容集中在非遗资源旅游开发、非遗旅游发展中的遗产传承、非遗旅游利益关系、非遗旅游保障体系等方面。^[5]与本文相关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的研究主要从三个层面开展：一是从宏观层面分析非遗旅游开发的模式，如汪宇明和马木兰（2007）^[6]认为非遗转型为旅游产品应保持原真性，传统音乐舞蹈类非遗项目适合采用实景歌舞展演模式；曹诗图和鲁莉（2009）^[7]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进行适应性分析，分别对表演艺术类、工艺美术类、民俗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提出旅游开发构想；阚如良等（2014）^[8]提出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的“主题村落再造”模式；戴俊骋和李露（2019）^[9]提出原生自然式开发、原地浓缩式开发、集锦荟萃式开发等非遗旅游开发的主要模式。二是从微观层面分析非遗旅游产品的开发，如朱竑和戴光全（2010）^[10]认为在非遗旅游化、产品化的过程中，应注重符号化、载体化、体验化、创意化；刘娟等（2017）^[11]认为以载体化形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符号进行合理解读，是实现无形遗产向旅游产品转化的首要条件；李江敏和李薇（2018）^[12]提出体验性是非遗旅游产品设计最重要的落脚点。三是从需求角度分析旅游者对非遗旅游产品的感知，如孙梦阳和石美玉（2012）^[13]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游憩者分类的基础上，分析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在地域内外游憩者动机及决策偏好的差异；张希月和陈田（2016）^[14]从游客感知的视角研究影响非遗旅游产品开发的系统机理，认为在非遗产品化营造过程中应注重游客的深度体验。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响应研究

近年来，旅游响应研究受到学术界的关注，研究的重点领域是旅游资源（如传统村落、非遗等）的旅游响应，其中非遗旅游响应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在研究内容上，主要以特定区域为例进行实证研究，如张建忠等（2017）^[15]以山西省为研究区域，在分析山西省非遗时空分布特征的基础上，采用定量分析方法测算非遗时空分布与旅游发展的相关度；李亚娟等（2021）^[16]针对我国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研究，从资源丰度、旅游经济发展、旅游化程度 3 方面构建分析框架，采用线性回归法分析非遗资源分布与地区旅游发展的关系；王乐和张滢（2023）^[17]在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响应度评价体系的基础上，运用熵值法与 TOPSIS 法对新疆各市（区、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响应度进行测算，以揭示新疆非遗旅游响应的空间分异规律及其影响因素。

总体而言，已有研究成果为探索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响应提供了理论和方法参考，但还存在不足之处：一是在研究方法上，学者们多运用回归分析方法、熵值法、TOPSIS 法等定量方法来分析非遗旅游响应水平，但对非遗旅游响应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还不够完善；二是在研究尺度上，现有成果采取单一的省级或市级尺度，尚未进行多尺度分析。因此，构建科学的非遗旅游发展评价指标，多尺度分析区域非遗旅游响应水平及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对促进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研究区域、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区域概况

长江经济带的面积约 205 万 km²，包含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云南、贵州 11 个省级行政单位，人口数量和 GDP 占全国比重均超过 40%。2016 年 3 月，中央审议通过了《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长江经济带正式作为国家级重大区域发展战略登上了历史舞台。2021 年，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制的《“十四五”长江经济带发展实施方案》首次将长江文化与生态环保、绿色低碳、区域协调等重点任务并列起来，使长江文化成为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为保护好长江文物和文化遗产，2022 年 1 月，中央部署启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这是推动长江流域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举措，也为做好长江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工作提供良好契机。长江文化

兼具时间长度和空间广度，三星堆古遗址、良渚古城遗址等古老而悠久，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等源远流长，红船精神、长征精神、抗洪精神等绚丽而多彩。不同的文化元素不仅在该区域孕育了多元独特的文化瑰宝，还孕育了丰富多彩的非遗资源，非遗数量众多且门类丰富。

（二）数据来源

本文中长江经济带非遗由国家级和省级非遗组成，国家级非遗数据来源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省级非遗数据来源于各省市人民政府官网及文化和旅游部门官网。因各省市公布的部分省级非遗门类存在差异，故本文对于分布于多个地区、拥有多个子项的情况进行拆分处理，经统计共有 9616 项（见表 1）。同时，本文借助 Map Location 与 Google Earth 查找非遗项目所在地的地理坐标信息，对 9616 项非遗的所属类型和位置信息以县级行政单位为基础单元进行归纳与整理，运用 Arc GIS 10.4 软件建立长江经济带国家级和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数据库。本文涉及的文化资源数据来自长江经济带 11 个省（直辖市）政府官网、文化和旅游部门网站，社会经济数据来源于 11 个省（直辖市）的统计年鉴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考虑到新冠疫情的影响，本文所涉及的社会经济数据均为 2019 年度。

表 1 长江经济带省域单元非遗数量统计表

省级行政区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湖南	湖北	江西	贵州	四川	云南	重庆	总计
非遗数量(项)	442	901	1245	751	642	722	664	1122	1249	1065	813	9616

（三）研究方法

1. 熵权 TOPSIS 法

熵权 TOPSIS 法是一种融合熵值法与 TOPSIS 法的综合评价方法。通过对原始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计算各评价目标与正理想解和反理想解之间的距离和相对接近度，并根据相对接近度进行排序。相对接近度取值为 0—1，越贴近 1，表明该目标距离理想解的距离越近，反之越远。该方法适用于将多个对象进行对比研究，从而找出最佳方案或竞争力最强的对象，广泛运用于产业发展水平评价、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行业竞争力评价等方面的研究。具体计算步骤如下：

（1）原始评价矩阵标准化处理

首先，为消除指标量纲不一致的影响，需要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标准化公式为：

$$Y_{ij} = \frac{X_{ij} - X_{\min}}{X_{\max} - X_{\min}} \quad (1)$$

式中： Y_{ij} 是无量纲化处理的第 i 个单位的第 j 个指标， x_{ij} 为第 i 个单位的第 j 个指标的原始值。

（2）计算各指标信息熵值

$$C_j = \frac{1}{\ln m} \sum_{i=1}^n e_{ij} \ln e_{ij} \quad (2)$$

式中：C_j 为第 j 个指标的信息熵值；e_{ij} 为第 i 个评价单元第 j 个指标的比重；m 为评价单元个数。

(3) 确定各指标权重

$$W_j = \frac{1 - C_j}{m - \sum_{i=1}^m C_j} \quad (3)$$

式中：W_j 为第 j 个指标的权重；m 为评价单元个数。

(4) 构建加强标准化矩阵

$$A = W_j \cdot Y_{ij} \quad (4)$$

式中，A 表示加权规范矩阵，W_j 表示上述熵值法得出的权重，Y_{ij} 为标准化矩阵。

(5) 确定正负理想解

$$\text{正理想解: } V^+ = \{\max A_{ij} \mid i=1, 2, \dots, m\} \quad (5)$$

$$\text{负理想解: } V^- = \{\min A_{ij} \mid i=1, 2, \dots, m\} \quad (6)$$

(6) 计算每个目标至正负理想解的距离

$$\text{正理想解距离: } d_i^+ = \sqrt{\sum_{j=1}^n (v_{ij} - v_j^+)^2} \quad (7)$$

$$\text{负理想解距离: } d_i^- = \sqrt{\sum_{j=1}^n (v_{ij} - v_j^-)^2} \quad (8)$$

(7) 计算每个目标与理想解的相对接近度

$$D_i = \frac{d_i^-}{d_i^+ + d_i^-} \quad (9)$$

式中: D_i 越大, 表明第 i 个评价单元的水平越接近最优水平。

2. 非遗旅游响应评价指标体系

非遗是人类生产、生活、实践的产物, 非遗的保护、传承、开发是一个复杂的体系, 受到多种社会经济的影响, 尤其是非遗旅游的发展。因此, 非遗旅游响应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不要单单考虑非遗文化资源本身, 还要考虑其所处地区的文化资源组合、旅游业发展水平、社会经济发展等多方面因素。因此, 本文参考已有研究成果[15, 16, 17], 遵循客观性、科学性和系统性的原则, 明确文化资源禀赋、社会经济环境和旅游发展环境 3 个准则层, 在此基础上遴选 12 个评价指标, 指标权重采用熵权法进行计算, 从而构建长江经济带非遗旅游响应评价指标体系 (见表 2)。

3. 地理探测器

地理探测器 (Geodetector) 是探测地理事物空间分异性的统计学方法, 可以有效地探测影响地理事物变化的驱动因子。相对于传统的空间统计方法, 地理探测器有其独特的优势, 即在分析过程中不需要做前提假设, 同时能够克服传统统计方法处理变量的局限性^[18], 已在地理学、经济学、生态学等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本文运用地理探测器中的因子探测器来测算影响因子的解释力程度, 分析相关影响因素对长江经济带非遗旅游响应水平的影响程度。其计算公式为:

表 2 长江经济带非遗旅游响应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准则层	要素层	指标层	属性	指标权重
非遗旅游响应评价体系	B1 文化资源禀赋	C1 非遗等级	D1 国家级非遗占比 (%)	+	0.119
		C2 非遗传承状况	D2 非遗传承人数量 (位): 国家级×5+省级×3	+	0.111
		C3 非遗影响范围	D3 流行区域的面积 (km ²)	+	0.095
		C4 文物古迹保护现状	D4 文物保护单位数量 (个): 国家级×5+省级×3	+	0.077
	B2 社会经济环境	C5 经济发展水平	D5 地区生产总值 (亿元)	+	0.113
		C6 居民消费能力	D6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	0.028
		C7 城乡发展水平	D7 城镇化率 (%)	+	0.021
	B3 旅游发展环境	C8 旅游发展水平	D8 旅游总收入 (亿元)	+	0.107
		C9 旅游接待规模	D9 旅游接待总人次 (万人次)	+	0.069
		C10 旅游资源丰度	D10 旅游景区数量 (个): 5A×5+4A×3+3A	+	0.075
		C11 旅游服务能力	D11 星级酒店数量 (个): 5 星×5+4 星×3+3 星	+	0.108
		C12 旅游交通水平	D12 公路密度 [km/100(km) ²]	+	0.077

$$q = 1 - \frac{1}{N\sigma^2} \sum_{h=1}^L N_h \sigma_h^2 \quad (10)$$

其中: L 为次一级区域个数 (影响因子聚类分析后的分区个数), N 为研究区数量, N_h 和 σ_h 为次一级区域个数和方差, q 为影响因子的解释力程度, 取值范围在 0—1 之间, q 值越大, 因子解释力越强。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长江经济带非遗分布特征

1. 分布类型

运用平均最邻近指数对长江经济带 9616 项非遗进行测算，得到长江经济带非遗空间分布平均最近邻指数表（见表 3）。由表 3 可知，长江经济带非遗总体的平均最近邻指数 $NNI=0.01 < 1$ ，且 Z 值为 $-185.7 < -2.58$ ， P 值为 0，显著性水平远低于 1%，表示长江经济带非遗的空间分布类型为集聚型分布模式。从省域尺度来看，长江经济带各省域单元非遗的平均最近邻指数 NNI 均小于 1， Z 值均小于 -2.58 ， P 值均为 0，显著性水平均远低于 1%，因此长江经济带非遗呈显著的集聚型分布态势，且各省域单元之间集聚程度差异较小。

表 3 长江经济带省域单元非遗空间分布平均最近邻指数表

指标	总体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湖南	湖北	江西	贵州	四川	云南
NNI	0.010	0.000	0.011	0.000	0.013	0.039	0.021	0.011	0.000	0.014	0.012
Z 值	-185.7	-40.22	-56.78	-67.48	-51.72	-46.63	-50.33	-48.76	-64.07	-66.66	-61.70
P 值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分布模式	集聚型										

2. 分布差异

运用核密度估计方法对长江经济带非遗进行核密度分析，结果显示长江经济带非遗存在以上海和苏南地区、浙北和渝西 3 个极高密度核心区，以成都、黔东南地区和南京为辐射中心所形成的 3 个次高密度核心区。由此可见，长江经济带非遗的空间分布总体呈现出组团状、“东西密、中部疏”的不均衡分布格局。长江经济带非遗资源空间分布差异受自然环境和人为因素的综合影响。首先，非遗源于人类的生产生活，上海和苏南地区、浙北、渝西、成都和南京等地区均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且人口密度较大的区域，人类活动对非遗分布有较大影响。其次，自然地理环境也对非遗分布产生较大影响，如长三角区域河流湖泊密布，长江、京杭大运河和黄浦江沿线以及太湖周边都是高密度区，依水而居的生活环境和对外交流的增多有利于非遗的产生。位于四川盆地的成都，山河密布的渝西和黔东南地区，地理环境相对封闭，稳定地理环境使得非遗受外界影响较小，有助于非遗持久而稳定发展。加之上述区域文化底蕴深厚，吴越文化、巴蜀文化以及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为非遗的孕育提供肥沃的土壤，奠定了非遗产生和发展的坚实基础。

（二）长江经济带非遗旅游响应水平

1. 省域尺度非遗旅游响应水平

运用熵权 TOPSIS 法测算长江经济带 11 个省域单元非遗旅游响应度，结果见表 4。由表 4 可知，江苏省相对接近度值最高，表明其非遗旅游响应水平最高；重庆市相对接近度值最小，表明其非遗旅游响应水平最低。其中，非遗旅游响应水平综合得分大于 0.5 的仅有江苏省，其余均小于 0.5，由此可见，江苏省非遗旅游响应水平远高于长江经济带其他省域单元。

表 4 长江经济带省域单元非遗旅游响应度综合得分表

省域	正理想解距离 D	负理想解距离 D-	相对接近度 C	排序
江苏	2376.482	11054.942	0.823	1
浙江	6272.178	6072.459	0.492	2
上海	8401.206	4781.724	0.363	3
四川	7846.937	4152.294	0.346	4
湖北	7914.405	3922.116	0.331	5
湖南	8521.852	3431.725	0.287	6
安徽	8879.559	3095.494	0.258	7
贵州	11459.026	2527.954	0.181	8
江西	10383.851	1845.795	0.151	9
云南	10674.781	1793.509	0.144	10
重庆	10523.213	1472.413	0.123	11

依据长江经济带省域单元非遗旅游响应度数值，运用自然断点法，将省域单元非遗旅游响应度划分为极高响应区、次高响应区、中度响应区、次低响应区以及极低响应区（见表 5）。从表 5 中可以看出，属于极高响应区和次高响应区的省域单元有 2 个，集中在长江下游地区，占省域单元总数的 18.18%；属于极低响应区和次低响应区的省域单元有 5 个，占省域单元总数的 45.45%，主要集中在长江上游地区。这表明长江经济带省域尺度非遗旅游响应水平较低，且非遗旅游响应水平空间分布不均衡，基本呈现出从长江上游地区向长江中下游地区递增的趋势。

表 5 长江经济带省域尺度非遗旅游响应水平分类

类别	省域	占比 (%)
极高响应区	江苏省	9.09
次高响应区	浙江省	9.09
中度响应区	上海市、湖北省、湖南省、四川省	36.36
次低响应区	安徽省、贵州省	18.18
极低响应区	江西省、重庆市、云南省	27.27

结合表 4 和表 5 可知，位于长三角地区的江浙沪三省非遗旅游响应水平最高，而位于长江上游地区的渝云贵和长江中游地区的江西等省份非遗旅游响应水平则相对较低，且省域单元非遗旅游响应度排序与地区生产总值排序基本一致，由此可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对省域尺度非遗旅游响应水平具有较大影响。例如，江浙沪所在的长三角地区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最高地区，该地区工业基础雄厚、商品经济发达、水陆交通便捷，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均十分发达，拥有众多世界级和国家级非遗项目，如昆曲、黄杨木雕、龙泉青瓷烧制技艺等，杭州西湖、苏州园林、嘉兴乌镇、上海外滩等世界著名旅游目的地聚集于此，为非遗旅游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和旅游环境基础。

2. 市域尺度非遗旅游响应水平

运用熵权 TOPSIS 法测算长江经济带 182 个市域单元非遗旅游响应度，结果见表 6。由表 6 可知，在长江经济带 182 个市域单元中，武汉市相对接近度值最大，表明其非遗旅游响应水平最高；奉节县相对接近度值最小，表明其非遗旅游响应水平最低。其中，非遗旅游响应度得分大于 0.4 的市域单元仅有 7 个，约占市域单元总数的 7%；非遗旅游响应度得分小于 0.2 的市域单元有 108 个，约占市域单元总数的 59.3%。由此可知，长江经济带市域非遗旅游响应度差异显著，且非遗旅游响应水平总体偏低。

表 6 长江经济带市域单元非遗旅游响应度综合得分表

市域	相对接近度 C	排序	市域	相对接近度 C	排序	市域	相对接近度 C	排序
武汉市	0.792	1	宜春市	0.219	62	凉山州	0.158	123
成都市	0.745	2	铜仁市	0.219	63	丽江市	0.156	124
杭州市	0.699	3	金山区	0.217	64	张家界市	0.155	125
苏州市	0.658	4	郴州市	0.215	65	六盘水市	0.153	126
南京市	0.578	5	吉安市	0.211	66	娄底市	0.152	127
长沙市	0.563	6	常德市	0.207	67	阜阳市	0.152	128
宁波市	0.543	7	沙坪坝区	0.207	68	黄冈市	0.152	129
浦东新区	0.517	8	奉贤区	0.207	69	铜梁区	0.151	130
无锡市	0.503	9	安庆市	0.207	70	大足区	0.151	131
合肥市	0.468	10	淮安市	0.207	71	长寿区	0.15	132
贵阳市	0.45	11	渝北区	0.206	72	雅安市	0.148	133
昆明市	0.447	12	黄山市	0.202	73	西双版纳州	0.147	134
温州市	0.417	13	南充市	0.201	74	六安市	0.146	135
遵义市	0.389	14	乐山市	0.199	75	南川区	0.145	136
绍兴市	0.386	15	巴南区	0.199	76	荣昌区	0.144	137
嘉兴市	0.384	16	安顺市	0.199	77	资阳市	0.142	138
台州市	0.382	17	咸宁市	0.194	78	益阳市	0.141	139
金华市	0.38	18	红河州	0.193	79	亳州市	0.14	140
常州市	0.377	19	十堰市	0.193	80	保山市	0.139	141
南通市	0.365	20	连云港市	0.191	81	湘西州	0.138	142
湖州市	0.356	21	宿州市	0.189	82	武隆区	0.137	143
徐汇区	0.345	22	大渡口区	0.189	83	淮北市	0.137	144
黄浦区	0.344	23	崇明区	0.187	84	鄂州市	0.135	145
长宁区	0.34	24	德阳市	0.185	85	昭通市	0.134	146
杨浦区	0.339	25	泸州市	0.184	86	阿坝州	0.134	147
虹口区	0.331	26	池州市	0.183	87	綦江区	0.134	148
静安区	0.329	27	萍乡市	0.183	88	普洱市	0.133	149
普陀区	0.328	28	北碚区	0.181	89	仙桃市	0.133	150
闵行区	0.32	29	景德镇市	0.179	90	巴中市	0.133	151
南昌市	0.311	30	新余市	0.178	91	文山州	0.133	152

扬州市	0.307	31	蚌埠市	0.178	92	淮南市	0.133	153
宝山区	0.303	32	玉溪市	0.178	93	随州市	0.132	154
徐州市	0.3	33	曲靖市	0.177	94	潼南区	0.132	155
镇江市	0.292	34	黔西南州	0.176	95	甘孜州	0.131	156
嘉定区	0.28	35	永州市	0.176	96	潜江市	0.13	157
舟山市	0.273	36	遂宁市	0.173	97	黔江区	0.129	158
宜昌市	0.27	37	眉山市	0.173	98	梁平区	0.128	159
黔东南州	0.264	38	永川区	0.171	99	黔南州	0.127	160
毕节市	0.258	39	宣城市	0.171	100	忠县	0.127	161
泰州市	0.253	40	江津区	0.17	101	垫江县	0.126	162
松江区	0.252	41	鹰潭市	0.169	102	荆州市	0.125	163
渝中区	0.251	42	抚州市	0.169	103	铜陵市	0.119	164
盐城市	0.251	43	楚雄州	0.168	104	迪庆州	0.119	165
九江市	0.245	44	黄石市	0.168	105	德宏州	0.119	166
株洲市	0.243	45	大理州	0.167	106	临沧市	0.118	167
襄阳市	0.242	46	自贡市	0.167	107	丰都县	0.118	168
芜湖市	0.238	47	涪陵区	0.166	108	天门市	0.118	169
上饶市	0.238	48	荆门市	0.166	109	开州区	0.117	170
衢州市	0.236	49	怀化市	0.166	110	石柱县	0.115	171
衡阳市	0.233	50	恩施州	0.166	111	云阳县	0.111	172
赣州市	0.231	51	滁州市	0.163	112	彭水县	0.108	173
丽水市	0.23	52	内江市	0.163	113	秀山县	0.108	174
江北区	0.229	53	合川区	0.163	114	巫山县	0.101	175
岳阳市	0.227	54	宿迁市	0.162	115	神农架林区	0.099	176
九龙坡区	0.226	55	万州区	0.161	116	孝感市	0.093	177
青浦区	0.224	56	璧山区	0.161	117	酉阳县	0.084	178
湘潭市	0.223	57	邵阳市	0.161	118	城口县	0.08	179
南岸区	0.222	58	攀枝花市	0.16	119	怒江州	0.079	180
马鞍山市	0.222	59	广安市	0.159	120	巫溪县	0.078	181
宜宾市	0.22	60	达州市	0.159	121	奉节县	0.037	182
绵阳市	0.22	61	广元市	0.159	122			

依据长江经济带市域非遗旅游响应度数值，运用自然断点法，将市域单元非遗旅游响应度划分为极高响应区、次高响应区、中度响应区、次低响应区以及极低响应区（见表7）。从表7中可以看出，属于极高响应区和次高响应区的市域单元有34个，约占市域单元总数的18.68%，且主要集中在长三角地区；属于极低响应区和次低响应区的市域单元有109个，占市域单元总数的近60%，所占比重较大，主要集中在长江上游地区。这表明长江经济带市域非遗旅游响应水平较低，且非遗旅游响应水平空间格局呈现不均衡分布。究其原因，主要是受到社会经济环境和旅游发展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例如，非遗旅游响应度排名前三位的市域单元分别是武汉、成都和杭州，这三座城市均为经济发展强劲的省会城市，据统计三座城市2019年地区生产总值在长江经济带各市域单元中均排名前五，且2019年的旅游总收入在长江经济带各市域单元中排名最高，位列前三。因此，非遗旅游响应度较低的市域单元应加快推进非遗旅游化进程，将丰富的非遗资源转化为旅游经济发展优势，实现非遗经济效益最大化，有利于促进长江经济带非遗旅游整体协调发展，实现长江经济带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

表7 长江经济带市域尺度非遗旅游响应水平分类

类别	市域	占比(%)
极高响应区	武汉市、成都市、杭州市、苏州市、南京市、长沙市、宁波市、浦东新区、无锡市、合肥市	5.49
次高响应区	贵阳市、昆明市、温州市、遵义市、绍兴市、嘉兴市、台州市、金华市、常州市、南通市、湖州市、徐汇区、黄浦区、长宁区、杨浦区、虹口区、静安区、普陀区、闵行区、南昌市、扬州市、宝山区、徐州市、镇江市	13.19
中度响应区	嘉定区、舟山市、宜昌市、黔东南州、毕节市、泰州市、松江区、渝中区、盐城市、九江市、株洲市、襄阳市、芜湖市、上饶市、衢州市、衡阳市、赣州市、丽水市、江北区、岳阳市、九龙坡区、青浦区、湘潭市、南岸区、马鞍山市、宜宾市、绵阳市、宜春市、铜仁市、金山区、郴州市、吉安市、常德市、沙坪坝区、奉贤区、安庆市、淮安市、渝北区、黄山市、南充市	21.98
次低响应区	乐山市、巴南区、安顺市、咸宁市、红河州、十堰市、连云港市、宿州市、大渡口区、崇明区、德阳市、泸州市、池州市、萍乡市、北碚区、景德镇市、新余市、蚌埠市、玉溪市、曲靖市、黔西南州、永州市、遂宁市、眉山市、永川区、宣城市、江津区、鹰潭市、抚州市、楚雄州、黄石市、大理州、自贡市、涪陵区、荆门市、怀化市、恩施州、滁州市、内江市、合川区、宿迁市、万州区、璧山区、邵阳市、攀枝花市、广安市、达州市、广元市、凉山州、丽江市、张家界市、六盘水市、娄底市、阜阳市、黄冈市、铜梁区、大足区、长寿区、雅安市、西双版纳州	32.97
极低响应区	南川区、荣昌区、资阳市、益阳市、亳州市、保山市、湘西州、武隆区、淮北市、鄂州市、昭通市、阿坝州、綦江区、普洱市、仙桃市、巴中市、文山州、淮南市、随州市、潼南区、甘孜州、潜江市、黔江区、梁平区、黔南州、忠县、垫江县、荆州市、铜陵市、迪庆州、德宏州、临沧市、丰都县、天门市、开州区、石柱县、云阳县、彭水县、秀山县、巫山县、神农架林区、孝感市、酉阳县、城口县、怒江州、巫溪县、奉节县	26.37

(三) 长江经济带非遗旅游响应空间差异的影响因素

1. 省域尺度因子探测分析

运用因子探测器从省域尺度对长江经济带非遗旅游响应各影响因素进行测算，得到因子探测结果（见表8）。

表8 省域尺度的影响因素因子探测运算结果

影响因素	D1	D2	D3	D4	D5	D6	D7	D8	D9	D10	D11	D12
q 值	0.287	0.373	0.320	0.378	0.997	0.431	0.173	0.434	0.460	0.395	0.377	0.255
p 值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由表8可知，解释力度最强的影响因子是地区生产总值（D5），q值为0.997，这进一步验证了前文经济发展水平对省域非遗旅游响应水平具有较大影响的论断。其他影响因子解释力度相对较小，均在0.5以下，其中，解释力度较大的是旅游接待总人次（D9）、旅游总收入（D8）和人均可支配收入（D6），q值分别为0.46、0.434和0.431，这也表明旅游业发展水平和居民消费水平对省域非遗旅游响应水平具有较大影响。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旅游业发展水平的提高，对地区非遗旅游发展具有显著正向的促进作用，有利于加大对非遗旅游发展的投入力度，引入新技术、新手段和新理念，创新非遗旅游发展形式，深度挖掘非遗文化内涵，为非遗旅游发展提供良好的经济发展基础和旅游发展环境，推动文旅融合实现高质量发展。同时，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激发人们的旅游消费动机，提高居民文旅消费水平，推动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而城镇化率（D7）对非遗旅游响应水平影响最弱，这表明随着文旅融合发展理念的不断深入，在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化发展所带来的弊端对非遗资源的影响越来越小，且随着城市发展的重心不断从物质层面 toward 精神与文化层面转化，人们对非遗资源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如何在城市发展中探索非遗旅游发展问题对促进文旅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非遗旅游响应评价体系准则层来看，q值较大的前6项指标在文化资源禀赋、社会经济环境和旅游发展环境三个准则层中均有分布，但主要还是集中在社会经济环境与旅游发展环境准则层中，这印证了经济发展水平和旅游业发展水平对长江经济带省域尺度非遗旅游响应水平影响较大。

2. 市域尺度因子探测分析

运用因子探测器从市域尺度对长江经济带非遗旅游响应各影响因素进行测算，得到因子探测结果（见表 9）。由表 9 可知，q 值大于 0.7 的影响因子有 4 个，依次为地区生产总值（D5）、人均可支配收入（D6）、旅游总收入（D8）和旅游接待总人次（D9），这与省域尺度非遗旅游响应水平的主导因素完全一致，这进一步印证经济发展水平、旅游业发展水平和居民消费水平对提高地区非遗旅游响应水平具有十分显著的积极影响，而国家级非遗占比（D1）则对非遗旅游响应影响最弱。相较而言，作为文化遗产的两个方面，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有密切关联。国家级非遗数量较少，难以对其产生较大影响，但其所具有的重大历史、文学、艺术和科学等价值，是非遗旅游发展的重中之重。从非遗旅游响应评价体系准则层来看，q 值较大的前 6 项影响因子均位于社会经济环境和旅游发展环境准则层中，表明长江经济带非遗旅游响应水平受社会经济环境和旅游发展环境的影响最大，对区域经济发展和旅游发展的依赖性较为显著。

表 9 市域尺度的影响因素因子探测运算结果

影响因素	D1	D2	D3	D4	D5	D6	D7	D8	D9	D10	D11	D12
q 值	0.162	0.261	0.190	0.285	0.816	0.753	0.692	0.747	0.741	0.226	0.657	0.252
p 值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综上所述，在长江经济带省域尺度和市域尺度上，非遗旅游响应水平的主导因素完全一致，均受旅游发展水平、旅游业发展水平和居民消费水平影响最大，这是因为非遗先天便具有市场化基因，许多非遗从诞生之初便处于千百年的生产与销售之中，受众较多。目前，国内非遗最主要的利用方式就是旅游开发，如非遗研学、非遗民宿、非遗演艺等。江苏夫子庙—秦淮风光带景区、贵州丹寨万达小镇、江西景德镇陶溪川文创街区等特色非遗旅游景区、小镇和街区等如潮涌至，非遗旅游融合发展已成为文旅融合发展的重要发展方向。因此，提高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带动区域旅游业发展，提升文旅消费能力至关重要，既能把丰富而多元的非遗文化资源存量激活，丰富旅游供给，将文化资源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又能使传承千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以延续与发展。

五、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以长江经济带 9616 项国家级和省级非遗为研究对象，在构建非遗旅游响应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 TOPSIS 法从省域、市域两个尺度测算长江经济带非遗旅游响应水平，采用地理探测器分析响应水平的影响因素，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 从分布情况看，长江经济带非遗呈现出显著的集聚型分布态势

在分布类型上，长江经济带非遗呈显著的集聚型分布态势，且各省域单元之间集聚程度差异较小；在分布差异上，呈现以上海和苏南地区、浙北、渝西 3 个极高密度核心区，以成都、黔东南、南京为辐射中心的 3 个次高密度核心区，具有“东西密、中部疏”的不均衡分布特点。

2. 从响应水平看，长江经济带非遗旅游响应总体上处于较低水平

长江经济带非遗旅游响应水平的区域差异明显，基本呈现出从长江上游向中游和下游递增的趋势，极高响应区主要集中在长三角地区；省域与市域层面的非遗旅游响应水平的空间格局相似，非遗旅游响应水平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有较强的关联性。

3. 从影响因素看，长江经济带非遗旅游响应水平受多种因素影响

从具体影响因素来看，长江经济带非遗旅游响应水平主要受地区生产总值、人均可支配收入、旅游总收入和旅游接待总人次的影响，这些因素对非遗旅游响应水平具有正向影响，其中地区生产总值的影响程度最大。

（二）对策建议

1. 深入践行文旅融合发展理念

在国家层面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的背景下，非遗资源丰富的长江经济带各省市要深入践行文旅融合发展理念，一是挖掘区域非遗文化资源，完善非遗传承人传承体系，积极引导非遗与旅游发展相适应；二是积极谋划建设非遗产业园、非遗文旅街区、非遗文化创意园区等非遗旅游空间载体，大力推进非遗产业的发展，以非遗产业发展助推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三是发展“非遗+”模式，将非遗与研学、民宿、文创、演艺、节庆等业态结合，有效激活非遗的内在潜能，形成非遗旅游产业供给新体系。

2. 采取差异化的区域非遗旅游发展策略

长江上游地区拥有大量气质独特、特色浓郁的民族文化，但区域内经济发展水平偏低，应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加大对非遗开发的资金投入，提高非遗旅游利用效率，促进非遗保护与旅游开发的良性互动。长江中游地区非遗资源禀赋一般，但交通较为便利，旅游产业发展势头良好，应强化非遗与旅游的融合，积极发展非遗旅游产业，提升旅游景区的文化品位。长江下游地区经济发达，城市化水平较高，非遗旅游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应充分利用技术、资金及市场优势，开发创意性强的非遗旅游产品，同时建立长效的非遗原真性评估制度，规避过度商业化对非遗真实性带来冲击及高度城镇化造成的非遗文化失传。^[19]

3. 在非遗旅游发展中突出地方文化特色

长江流域上、中、下游地区的文化习俗各具特色却又彼此联系，非遗旅游产品只有扎根于地域文化，才能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市场吸引力。一是将地域性非遗文化与旅游资源相融合，打造个性突出、特色鲜明的旅游品牌，对传统文化历史积淀深厚、代表性项目集中、形式和内涵保持完整的特定区域，可以设立非遗文化生态保护区，实行区域性整体保护和开发。二促进当地非遗与旅游景区相融合，不断完善非遗进景区、非遗进村寨、非遗进街区等非遗旅游发展形式，打造出一批具有影响力的非遗旅游景区、街区、小镇和村寨，设计并推广区域精品非遗旅游线路。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 人民日报, 2022-10-16.

[2] 赵悦, 石美玉. 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中的三大矛盾探析[J]. 旅游学刊, 2013, (9): 84-93.

[3] 邵秀英, 刘亚玲, 李昭阳, 等. 山西省传统村落旅游响应空间分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 中国生态旅游, 2021, (6): 981-994.

[4] 张海燕. 基于交通发展的武陵山片区旅游产业集聚机理及响应路径[J].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3): 96-103.

-
- [5] 欧阳红, 代美玲, 王蓉, 等. 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研究进展述评[J]. 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 2021, (5):124-132.
- [6] 汪宇明, 马木兰. 非物质文化遗产转型为旅游产品的路径研究——以大型天然溶洞实景舞台剧《夷水丽川》为例[J]. 旅游科学, 2007, (4):31-35.
- [7] 曹诗图, 鲁莉. 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探析[J]. 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 2009, (4):75-78.
- [8] 阚如良, 王桂琴, 周军, 等. 主题村落再造: 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模式研究[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14, (6):108-112.
- [9] 戴俊骋, 李露. 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和地方建构[J]. 旅游学刊, 2019, (5):3-5.
- [10] 朱竑, 戴光全. 文化遗产转化为旅游产品: 理念·原则·目标[J]. 旅游学刊, 2010, (6):6-7.
- [11] 刘娟, 方世敏, 宁志丹. 遗产旅游价值游客感知及其提升策略——基于网络信息的内容分析[J]. 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 2017, (6):112-117.
- [12] 李江敏, 李薇.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活化之道[J]. 旅游学刊, 2018, (9):11-12.
- [13] 孙梦阳, 石美玉. 非物质文化遗产游憩者动机及其市场细分研究[J]. 旅游学刊, 2012, (12):95-102.
- [14] 张希月, 陈田. 基于游客视角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影响机理研究——以传统手工艺苏绣为例[J]. 地理研究, 2016, (3):590-604.
- [15] 张建忠, 温娟娟, 刘家明, 等. 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时空分布特征及旅游响应[J]. 地理科学, 2017, (7):1104-1111.
- [16] 李亚娟, 罗雯婷, 王靓, 等.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布特征及旅游响应研究[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21, (8):184-191.
- [17] 王乐, 张滢. 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响应度及影响因素分析[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3, (2):263-274.
- [18] 吕晨, 蓝修婷, 孙威. 地理探测器方法下北京市人口空间格局变化与自然因素的关系研究[J]. 自然资源学报, 2017, (8):1385-1397.
- [19] 李江敏, 赵青青, 陈静. 长江经济带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分布特征与影响因素[J]. 经济地理, 2020, (12):191-198.